

俄罗斯 现代化之路 ——为何如此曲折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 著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新华出版社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

——为何如此曲折

(俄)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 著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 / (俄罗斯) 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 .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0

ISBN 7 - 5011 - 5412 - 0

I . 俄… II . ①米… ②徐 III . ①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②现代化建设—研究—俄罗斯 IV .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146 号

图字：01 - 2001 - 4276 号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

© Мигранян А., 1997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ALL RIGHTS RESERVED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

——为何如此曲折

(俄)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 著

徐葵 张达楠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8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5412 - 0/D·873 定价：2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 65895562 65897685

译者的话

本书是作者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把他最近 10 多年来在他的国家——苏联和俄罗斯经历巨大转折性变化的这些年中所写的专论和政论文章汇集在一起的一本文集。全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俄国 19 世纪以来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曲折历史道路的思考，探讨为什么这个国家多次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每次都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在几十年后重新回头来开始这个进程的原因。二是对最近 15 年中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改革的进程和失败的分析和评论。今年正好是苏联解体的 10 周年，在世纪之交普京总统接过叶利钦的遗产上台执政后，俄罗斯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希望，当我们现在回顾和研究俄罗斯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的时候，这本文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苏联和俄罗斯这段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本书作者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是当今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他 1949 年出生于亚美尼亚的首府埃里温，现年 52 岁。从 1967 年到 1982 年，他曾先后就学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72 年在该校获硕士学位）和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研究生班（1978 年在该所获博士学位），学习的专业是美国政党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问题。1990 年—1991 年，他曾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大学、伯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

米格拉尼扬的职业生涯是在高等学校中执教开始的。1985年起他到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8年又转到苏联科学院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91年成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1992年曾任俄罗斯议会独联体问题委员会首席顾问和独联体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1993年曾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高级顾问。1993年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从1994年底起，应经济和社会改革国际基金会主席沙塔林的邀请转到该基金会工作，担任基金会副主席。

米格拉尼扬历年来著作甚丰。1990年以前，他曾有一些学术刊物上和集体著作中发表过一系列论述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问题的论文和篇章。从1986年起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苏维埃制度的性质和这一制度向民主化的转型问题。1989年他出版了《民主与道德：个人、社会和国家》一书，该书是当时苏联政治学著作中第一部探讨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发展公民社会问题的论著。从90年代初以来他是俄罗斯一些有名报刊的经常撰稿人，发表了大量的政论和时评文章，成为当前俄罗斯很有名的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之一。1997年他出版了《探索自我特性中的俄罗斯》一书，今年还出版了《俄罗斯能从混乱走向秩序吗？》一书。他在这两部书中分析了苏联和俄罗斯最近15年急剧发展变化的历史，论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俄罗斯10年来政治进程的戏剧性发展。

我们这本译著《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主要是根据作者于1997年出版的《探索自我特性中的俄罗斯》一书翻译而成的。但现在本书的这本中文版与1997年的俄文版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篇幅上也有了扩展。这是因为1997年出版的俄文版中作者论述问题的时间范围上截止于1995年，我们在翻译时觉得从1995年到2000年俄罗斯的形势又有许多新

的发展和变化，而作者在这 5 年中也发表了不少新的政论和时评，今天在出版此书中文版时应把这些新材料增补进来，以增加本书的时代感和新鲜感，同时也需要请作者根据今天的形势来改写 1997 年版的结束语。作者根据我们的要求欣然给我们寄来了大批新材料供我们选用，还重写了结束语。我们限于本书的篇幅，也为了使全书更加精练，便于阅读，未把作者寄来的新材料全部选用，同时也删除了俄文版中原有的个别在内容上已显得有些过时的文章或文章中的某些部分。这些情况是需要在这里向读者说明的。

我们认为，本书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是由于主线比较集中，所有论文和评论都是围绕俄国 - 苏联 - 俄罗斯的现代化和改革这个中心的，又是按历史时序编集的，所以在内容上仍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而且本书还有以下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具有历史的深度。作者说，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以后曾对俄罗斯几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命运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从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的视角审视了俄罗斯近 200 年政治发展史中的各个重要阶段，力图弄清楚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艰难，并总结应从历史上吸取的经验教训。

二是具有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比较中来看俄罗斯问题的广度。作者不但从俄罗斯本身的历史发展中，而且还通过同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走的现代化道路的对比中来审视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以图寻找实现现代化的一些一般性规律，并从中思考俄国多次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所以遭到失败的原因。作者从这种比较中归纳出了三条现代化道路：一是英国的现代化道路，二是法国的现代化道路，三是俄国和苏联的现代化道路。

本书第一部分中收入的几篇专论就是论述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写于 1987 年前后，这些论文是作者对俄罗斯 200 年的历史进行思考的结果，反映了作者对苏联和俄罗斯应走什么样的现代

化道路的基本看法。第一部分中最后一篇文章则是作者论述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的。作者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曾对这次改革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是苏联改变俄国过去的历史命运，实现现代化的良机，但是从 1989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后，作者就认为他犯了改革战略的错误，将使权力失控，使改革遭受失败。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收集于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的文章都是论述 1989 年—2000 年间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变革中的现实问题的。作者亲自经历和参与了这 15 年先是苏联、后是俄罗斯的变革。他对 10 多年政治变革各个阶段中的主要事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评述，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持有相当强烈的批评意见。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 10 年中政治变革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各个阶段中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的背景和过程。其中有的文章也涉及到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特征问题，例如平民主义、知识分子特点、民族关系等。

按照作者的看法，今天俄罗斯学术界在对待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可粗略地分为三派。一派坚持俄罗斯的特殊发展道路思想，对西方和改革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反对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另一派为激进自由派，主张以最快的速度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机制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并实行最快的市场经济改革。第三派也主张在俄罗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但认为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保持国家的可控性，推行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作者认为他自己属于第三派。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是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实现的，英国形成比较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度经历了约 500 年的时间，法国在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约 150 多年的反复才使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使社会多数在价值观上取得认同

感，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在政权的有效作用下处理和协调好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四个因素阻碍它实现现代化：一是农奴制（俄国）和公民的无权（苏联时期）；二是只突出国家，而无视社会和个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吞噬了社会和个人；三是官僚阶层掌握全权，官僚垄断了政治社会生活；四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孤立，不能吸收和消化世界文化，不能形成在本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

作者认为像苏联这种极权主义制度，在改革中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必须经过权威主义阶段，然后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阶段。对俄罗斯社会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比庸俗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他认为企图一步就走到民主化，就必然会出现政治势力的两极化，导致国家的失控和混乱。

米格拉尼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 1988 年—1991 年间曾在苏联政治界和知识界引起过热烈的争论，至今在俄罗斯思想界仍然是有争论的。不过从苏联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他却是较早地看到苏联那样搞改革必将出现政局的失控和混乱的一名学者，80 年代末以后苏联的局势发展和联盟中央的垮台都不幸被他所言中。

米格拉尼扬至今仍坚持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同样面临着如何选择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还没有跨过前进中的岔路口，它已接近于，但还未冲破俄罗斯发展的怪圈，俄罗斯 200 年来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那些阻碍因素仍是有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 10 多年来对中国的改革一直很关心，并抱有热情肯定的态度。他认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是正确的；赞赏我国在发挥国家和党的积极作用的情况下渐进地进行经济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做法；认为俄罗斯需要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读者在他写的“致中国读者”中和本书的有些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作者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徐葵、张达楠、张树华、李方仲、宋锦海、黄天莹、肖桂森、李永庆、李禄、刘显忠、许华和张红等同志。全部译文由徐葵和张达楠二人共同做了校对。由于翻译和校对的时间都比较紧，所以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徐 葵

2001年10月6日

致中国读者

今天俄罗斯经历着并不轻松的时期：一个同叶利钦的遗产根本决裂的过程正在发生。普京总统力图恢复俄罗斯国家的主体性，把物质、金融和信息资源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便制订出使国家摆脱拖延已久的危机而获得发展的必要战略。

对现在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中国的改革经验又一次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你们辽阔广袤的国家在发挥国家和党的积极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成功地实现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时期忽视了这个经验，结果我们得到的是苏联的解体，叶利钦在统治俄罗斯时期也忽视了这个经验，而这时候我们国家却被一小撮攫取了基本物质、金融和信息资源的寡头集团私有化了。

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本书分析了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这种分析也许不仅对研究从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向市场和民主政体过渡时期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颇为有用的，而且对一些政治家也是颇为有用的，我斗胆相信，他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将会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为什么需要研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犯的错误，以免重犯起初是在苏维埃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后来则是在形成新的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悲剧性错误。我认为，对先是苏联的、后是俄罗斯的改革的悲剧性经验有了了解，就可以巩固中

国领导人对他们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认识，可防止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进行急剧政治改革的诱惑，因为这些诱惑有可能会破坏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改革成果的可预测性。

作为《致中国读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把我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虽非俄罗斯，但我们还是要……》的小文章附在这里请你们一阅。这篇文章是我于 1996 年在上一次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之后几个星期为我那时主编的《我的报纸》（《莫斯科真理报》的附刊——译者）写的。我想，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所作的比较分析，会使本书的中国读者感兴趣，并且觉得有参考意义，这种比较分析也可使读者对本书总的架构和我对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以及现阶段俄中关系的性质的评价获得一个概念。

中国虽非俄罗斯，但我们还是要…… (写于 1996 年 2 月 7 日)

去年年底，我率领一个不大的代表团到了中国。在各地进行的参观访问、同各级人士举行的会见、与中国同事们就这个巨大国家中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进程所作的讨论，都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过去一年中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家和分析家访问了这个国家，并就中国的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有什么独创，但我尽管迟了一些，也想从我所能理解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指出其最重要之处。限于我这个栏目的篇幅，我只说最重要的。

中国改革的实质和推行这些改革的方式及速度在邓小平有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公式中得到了反映。这就是说，中国领导人经过 16 年的改革懂得，必须保持国内经济与社

会政治进程的可控性、保持稳定和保持方针路线的继承性。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呈现着活力，但是就速度而言各地的活力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各种变化是可控的，而变化的结果则是可以预测的。中国人与我们不同，正是他们成了最前后连贯地遵循柏克^①、夏多勃里昂^②、德·迈斯特尔^③、哈耶克^④和波普尔^⑤等西方有机保守主义传统的学生，这一传统把社会看作一个精细的有机体，并警告说任何企图以一个臆造的图式为基础急剧地进行机械改革的尝试都可能导致直接相反的结果。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感到奇怪，即不论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性的俄罗斯人，还是批评中国的改革速度和方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是

① 柏克（Edmund Burke, 1727 年—1797 年），英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辉格党领导人之一。著有《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 年）。他崇尚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及其习俗的宏伟力量，认为政治制度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约定俗成的权力体系和习惯遵守的惯例；崇尚政体平衡观念，认为平衡是指国家的几大既得利益势力之间的平衡。在政治学说史上有人称他为自觉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译注

② 夏多勃里昂（Francoise - Rene de Chateaubriand, 1768 年—1848 年）法国作家，浪漫主义者。著有《基督教真谛》一书（1802）。——译注

③ 迈斯特尔，约瑟夫·德（1753 年—1821 年），萨伏依政治理论家。1792 年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吞并萨伏依后，他采取反对法国革命的态度。著有《法兰西论述》（1796）和《论教皇》。——译注

④ 哈耶克（1899 年—1992 年），英国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者、现代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于 1974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译注

⑤ 波普尔（1902 年—），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相信知识是由心灵的经验逐渐形成的。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 年）、《历史主义的贫困》（1957 年）、《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 年）等。——译注

脱离了这个国家的现实条件来进行抽象，都不知不觉地想推动中国社会去走体现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性的道路，尽管人们根据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改革的经验已经清楚，这是一条走向解体、混乱和失去可控性的道路。

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改革的连贯性问题，中国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的。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把握住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以便把新解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和社会上出现的新利益，纳入到在推行改革的执政党确定的一定政治范围框架内进行建设性相互协作的进程中去。这个进程是极其精细的，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以便一方面保持社会制度总的稳定性和国家总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又给予新的力量对政治体制实现变革的可能。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追随的目标是，保证在各种社会政治和地区利益之间实现磨合和建设性的相互协作。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切地和不急不躁地图在新的利益形成过程中使它们适应于中国议会的框架，同时用新的内容去充实议会的工作，也使它们适应于把中国共产党和反映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八个其他党派的工作协调起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框架。中国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力图做到在俄国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而未能做到的事情。当时没有得到通过的洛里斯—梅利科夫^①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各种民族地区利益和社会利益能适应于权力有限的议会的框架。这一点在苏联改革时期也未能做到，但这时已经是由于别的原因了。苏联共产党应该是一支使大家都能学会适应于，并保证改革进程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的力量，可是它由于

^① 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年—1888年），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1877年—1878年为高加索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人。1880年任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宁最高治安委员会主席，1880年—1881年任内务大臣。——译注

改革者们采取的忙忙乱乱和并不高明的行动而垮台了。不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还是在第二种情况下，被解放出来的社会政治力量没有变成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因素，而成了社会制度的破坏者，变成了反体制的因素。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未能实现上面指出的中国改革的积极经验这一点，决不意味着这个经验在我们能够巩固我们的国家政权和恢复对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的控制之后就不能加以利用了。

最后，说几句关于俄中关系的话。一系列俄罗斯政治学家在不久前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把中国看作俄罗斯可能的敌人。在我看来，在现阶段没有任何根据把中国看作敌人。在未来几十年时间中，中国将忙于中国的国内问题：忙于统一祖国，忙于同贫困作斗争，忙于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它不需要军事的或其他的冒险，它需要的是国内的稳定和边界上的稳定。如果俄罗斯经过几十年之后仍然是那样一个孱弱和效率低下的国家，那么对它来说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从爱沙尼亚（按照爱沙尼亚人的意见，我们同爱沙尼亚也有严重的领土问题）开始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威胁。在现阶段，当正在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的单极体制的进程的时候，中国更可能是与俄罗斯一起进行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的伙伴。

序　　言

奉献给你们的这部专论与时论文集，是我多年来对俄罗斯不同历史时代的命运和使命进行长期思考的结果。文集在形式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当我于 1987 年着手写本书头四篇专论的时候，我首先想要弄清的是，俄罗斯曾多次开始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在所有这些尝试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而不得不在几十年后重新回头来做这一工作。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时候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推行改革政策已有两年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对过去进行的几次现代化尝试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得出回答，我们这一次就能避免重犯旧的错误。

我之所以为本书的第一部分起了“俄罗斯会有前途吗？”的标题，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我自己在对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所作的分析是以恰达耶夫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作为出发点的，我力图去理解他所作的“俄罗斯不会有前途”这一预言的含义。我在头两篇专论中从这个视角审视了俄罗斯近 200 年政治和体制发展史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我力图弄清俄罗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推翻它的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的预言。在第三篇专论中，我特别注意分析俄罗斯的一个特殊问题——暴力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正确理解暴力，在我写这篇专论的当时，以及在尚远未实现现代化的今天所起的作用，这对选择实现现代化的

方式、确定现代化的速度与其步骤的连贯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第一部分的后面几篇专论中，我试图弄清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中形成的政体的特征，这种政体是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演变的特征。在分析改革时期的政治改革的几篇专论中、我不局限于只对改革家们所犯的这一些或那一些错误进行批评。我也提出了我自己对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在我看来，我提出的主张是更适合于那个时期俄罗斯的需要和政治现实的。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如果我的建议能得到采用，我们就能够在保持苏联的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同极权主义政体的决裂。在第一部分的最后几篇专论中，读者可看到对改革政策的失败原因的详细分析，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家们在没有很好搞清社会制度的性质的时候，就企图改变这种社会制度。

除了在基本上是在 1992 年写成的“俄罗斯会有前途吗？”这个总题目下的一系列专论外，我在书中收进了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改革时期和其后几年的政治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作了补充、深化和细化。此外，书中还收进了从 1998 年到 2000 年发表的一系列基础性论文，这些文章对这个时期俄罗斯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和政治的分析，并勾画出了 15 年（1985 年—2000 年）大变革和大动荡的图画。

除了有关国内问题的论文以外，我认为还需要把有关对外政策的一系列论文包括进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我认为，这样读者就可对 15 年的动荡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概念，因为国内政策中的许多错误和失误是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严重的失算互为因果的。

收集在这里的一些专论所遭遇的命运不是很简单的。许多主要杂志出于意识形态或书报检查的考虑，直到苏联解体以前都拒绝刊登我最早写的那几篇专论。它们却非常愿意发表能够直接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那些部分。收集于本书的个别文章从 1988 年

起曾先后在《别无选择》这本论文集和《新世界》杂志上得到发表，也曾发表于国内和国外的其他文集中。只有头两篇专论到1995年才第一次发表。所以，这些在对俄罗斯转折性的10多年时间的不同年份中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专论和政论文章现在是第一次收集在一本书中。

本书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文系科的大学生和广大社会人士为读者对象。